

人口迁移背景下的那达慕赛事的城际传播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

欧尼贡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DOI: 10.61369/SSSD.2026070040

摘 要 : 在人口大规模迁移与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作为文化传承与流动的载体, 其跨地域传播现象日益显著。本研究以蒙古族传统盛会“那达慕”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传播为个案, 聚焦于人口迁移引发的文化流动与城市多元文化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 探讨那达慕赛事如何在城际迁移过程中被引入长春、实现本土化调适, 并形成跨民族的文化实践。研究发现: 那达慕在长春的传播不仅依赖于蒙古族迁移群体的文化自觉与组织推动, 也得益于城市文化政策的吸纳与大众媒体的跨地域联动; 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仪式性展演”与“日常化参与”的双重面向, 成为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的互动视角出发, 为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在非传统聚居区的传播机制、城市文化生态的构建以及传统体育现代转型提供了实证参考。

关 键 词 : 人口迁移; 那达慕; 城际传播; 文化适应; 长春市; 少数民族体育

Research on Inter-city Communication of Nadam Competi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Changchun City

Ounigo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cross-region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ity sports events, as carrier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mobi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ak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Mongolian traditional festival "Nadam" in Changli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mobility triggered by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ulticulturalism.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field researc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Nadam festival was introduced to Changchun during intercity migration, underwent localization adaptation, and formed cross-ethnic cultural practi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Nadam in Changchun relies not only on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Mongolian migrant community but also benefits from inclusion of urban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cross-regional linkage of mass media. During its dissemination, Nadam presents a dual aspect of "ritual performance" and "daily participatio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urban multicultural landscap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n-traditional settlement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Keywords : population migration; Nadam; inter-urban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Changchun City; ethnic minority sports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

本研究聚焦于蒙古族标志性文化盛会——那达慕, 如何从其传统草原核心区, 迁移并植根于吉林省长春市这一非传统区域, 成为观察民族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传播、适应与融合的典型案列。

我国持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构成了那达慕城际传播最根本的社会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已

超5亿, 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流动, 不仅是经济要素的转移, 更是文化载体的空间位移。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标志着政策焦点从“土地”转向“人”, 核心任务在于促进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与文化认同。以长春为代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汇集了大量来自蒙古族聚居区及其他地区的迁移者, 形成了一个文化需求多元、社会网络交织的新城市社群。城市管理者与社区面临着构建包容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实压力, 这为那达慕等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进

入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了迫切的社会需求和潜在的实施场域。

国家层面,民族体育赛事被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使命,其功能已从单纯的民族节庆,升华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从“仪式性表演”向“参与性实践”和“融合性平台”的转型,为那达慕在非民族地区寻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与合法性依据。

综上所述,那达慕在长春的落地生根,是人口迁移带来的文化流动需求与民族体育自身创新转型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旨在深入这一鲜活场景,具体探究:在人口迁移所塑造的新的城市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中,那达慕赛事通过何种组织机制、符号调适与媒介策略,实现了有效的城际传播与在地化生存?其举办又如何具体影响了迁移者的文化认同、本地居民的文化认知以及城市整体的文化多样性生态?对这一过程的剖析,将为理解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在流动中保持生命力、在融合中促进社会团结,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二) 研究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人口迁移背景下那达慕赛事的城际传播,拓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边界。首先,研究将人口迁移视为文化传播的动态载体,突破了以往将民族体育赛事局限于原生地的研究范式,揭示了“人随业走、文化随行”的跨地域传播逻辑,为体育社会学与人口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同时,研究揭示的“传播代际衰减”“商业化与文化本真性的张力”等问题,为赛事组织者、文化管理部门及相关社会组织优化传播策略、平衡文化保护与市场开发提供了实证依据。项目提出的《那达慕文化真实性公约》草案、青年传播者培养计划及系列化内容传播策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推广价值,可为其他少数民族节庆赛事在城际传播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是指个体或群体跨越一定行政边界进行永久或半永久居住地变动的行为,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变化的重要推手。国际通用的人口迁移统计口径一般包括出生地、五年前常住地和最近一次迁移^[1]。本质上,迁移流动的统计标准是常住地是否改变。只是在户籍制度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中国社会情境之下,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概念在国际通用定义的基础上由于加入户籍而使常住地的识别变得相对较为复杂。按照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迁移人口一般指户口登记地随居住地发生改变的人口。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文献中,可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最为常用的概念分别是“migration”(迁移),以及“migrant”(迁移者);前者指常住地发生了跨越一定行政边界的空间移动事件,后者指发生这一空间移动事件的行为主体^[2]。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是中国人口动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文化保护、社会发展、区域经济与民族关系等诸多复杂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371万人^[3]。户籍迁移意愿是落户的基

本前提,纵观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行为和结果,与我国市民化、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同时影响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整体质量与效能。吴正彪、杨昌恒梳理了多民族省份贵州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的特点,发现每个移民点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共同居住,多民族性的特点突出。研究后得出结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过程中各民族交错杂居格局更为明显^[4]。

(二) 那达慕赛事相关研究

那达慕大会,源于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意为“娱乐”、“游戏”,通常包含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竞技项目,是蒙古族及其他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体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本文旨在梳理关于那达慕大会的研究文献,探讨其历史演变、文化内涵及现代发展。那达慕起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和实践,传承至今已有近800年历史^[5],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凝聚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精髓。“那达慕”,在《简明蒙古语辞典》中被解释为:群众性娱乐活动;玩耍,如玩乐、玩弄、戏弄。“耐日”,在《简明蒙古语辞典》中被解释为:和睦之意;礼物,适宜之意;宴会、娱乐,游戏之意。通过对字义的梳理发现,耐亦日或那达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愉悦的状态。“那达慕”词条一般与“耐日”词条紧密连用,叫做“耐日·那达慕”,那达慕是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那·恩和、确吉编著的《蒙古族那达慕》从历史学视角系统的研究了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认为搏克、射箭、赛马一开始都是作为生产工具产生,并有生产工具转向军事手段,后来由于人们的娱乐需要而形成那达慕^[6]。以“男儿三艺”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乃日那达慕”是源于匈奴、东胡时期,直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时期搏克、赛马、射箭等的雏形分别形成,14-15世纪“男儿三艺”统一为那达慕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在16-19世纪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那达慕大会作为一项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民族特色的文化盛事,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扩展,其影响力已远超传统的地域限制。学者夏宁博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以人为中心、以节庆旅游为基点、以物化的形态为载体、以广大观众关注点、以学校教育为方式、以宣传和评论为目的途径中得以传承的^[7]。2006年5月20日,“那达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那达慕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保护力度,促进了其文化的传承与国际传播。

(三) 体育赛事影响

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不仅促进了体育竞技本身的发展,还对社会多层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育赛事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Crompton在研究中指出体育赛事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通过赛事举办对该城市的收入、产出、投资、就业等经济指标所产生的净变化来最终影响到城市整体的经济发展^[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体育赛事通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投资回报并非总是正向的。高昂的成本有时也会导致债务累积。因此,举办城市需要谨慎评估预期收益与潜在风险,合理规划。体育赛事对社会包容性具有影响。体育赛事的多样性参与为各类人群均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体育赛事形成了一种跨越社会边界的社会互动,这种

社会融洽和团结有助于减少社会分裂和歧视现象^[10]。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问卷 + 访谈 + 观察），综合量化与质性数据，系统探究人口迁移背景下那达慕赛事在长春市的城际传播机制、文化适应过程与社会效应。研究设计遵循“宏观模式识别—微观机制阐释”的逻辑路径，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层次：

（一）在量化研究层面

项目组设计了《那达慕赛事城际传播研究调查问卷》，涵盖基本信息、赛事认知、参与意愿、传播渠道、文化认同等五大维度，共25个问题。问卷面向迁移人口与本地居民两类群体进行对比抽样，计划在长春市及鄂尔多斯市回收有效问卷100份以上，通过描述性统计与交叉分析，识别赛事知晓度、参与动机、信息获取渠道等方面的整体特征与群体差异。

（二）在质性研究层面

项目组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实地观察。访谈对象包括赛事组织者（如那达慕筹委会成员）和迁移人口代表（区分为第一代与第二代迁移者），以揭示赛事跨城移植的组织策略、文化调适机制及代际传承差异。实地观察聚焦于鄂尔多斯与长春两地那达慕现场。

四、研究发现

（一）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

调查维度	那达慕赛事知晓度		信息获取渠道				参与意愿	参与动机	
	听说过	了解内容	社交媒体	亲友介绍	传统媒体	其他	愿意	文化认同	社交
占据比例	75%	25%	45%	28%	15%	12%	65%	42%	38%

（二）数据分析

1. 赛事知晓度较高，但认知深度不足

问卷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那达慕，表明赛事在长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有25%的受访者能够准确了解那达慕的具体内容，能够完整说出“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的仅占32%。这一“知晓率高、认知度低”的现象说明，那达慕在传播过程中仍以“符号化”呈现为主，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系统传递。

2. 社交媒体主导传播路径，人际网络发挥“桥接”作用

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社交媒体（微信、抖音、快手等）占比最高，达45%，其次为亲友介绍（28%），传统媒体仅占15%。值得关注的是，迁移人口更依赖“同乡群”“民族社团”等人际网络获取信息，这一比例高达37%，明显高于本地居民的12%。这表明，迁移社群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连接赛事与本地居民的“桥接节点”。

3. 迁移人口参与意愿强烈，文化认同驱动行为

在参与意愿方面，迁移人口中78%表示愿意参与那达慕，远高于本地居民的51%。其参与动机以“文化归属感”（62%）和

“社交需求”（35%）为主，体现出赛事在迁移者中承担着“文化重建”与“情感联结”的功能。情感驱动的参与模式，使得那达慕不仅是文化活动，更成为迁移者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传播仍存局限：覆盖面有限、内容深度不足

尽管那达慕在长春初步建立了影响力，但调查也暴露了传播的明显短板。超过四成的本地居民表示“从未听说过”那达慕，宣传仍以民族社群内部为主，缺乏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动。此外，传播内容多集中于赛事“精彩瞬间”，属“事件性传播”，而对那达慕历史、精神内涵的“价值性传播”严重不足，导致受众理解多停留在“看热闹”层面。

五、结论与展望

在人口大规模迁移的背景下，那达慕赛事从草原核心区向长春等城市的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制，而是一场由人口流动驱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文化重构过程。研究表明，迁移人口既是赛事信息的接收者，更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迁移社群构成了赛事信息扩散的“毛细血管”，第一代迁移者凭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成为赛事参与的核心动力。然而，第二代、第三代迁移者的文化认同明显衰减，代际传承面临挑战。

为适应城市空间与受众结构，那达慕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本土化”转型：赛事内容趋于精简与符号化，更具互动性的服饰、歌舞、美食等元素被凸显，赛事功能从“民族内部节庆”向“城市公共节庆”转变。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破圈”作用，但当前传播仍以“事件性传播”为主，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受众认知多停留在表层。

展望未来，那达慕在城市的生命力将愈发显现。建议从以下方向深化研究与实践：一是探索激发第二代迁移者文化认同的代际传承机制；二是平衡文化本真性与商业开发的关系，推动行业规范建设；三是构建“事件传播”与“价值传播”并重的媒介策略；四是拓展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揭示城市特质对民族赛事传播路径的影响。期待更多研究关注民族传统文化在流动社会中的生存逻辑，推动那达慕从“民族的节日”走向“城市的节庆”，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周皓.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比较 [J]. 人口与经济, 2024, (04): 32-44.
[2] 朱宇, 林李月, 李亭亭, 等. 中国流动人口概念和数据的有效性与国际可比性 [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2991-3005.
[3] 朱星羽, 木永跃. 流动与融居: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 (02): 178-189.
[4] 冯雪红, 张欣. 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及其学术脉络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12): 91-100.
[5] 李秀芳. 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那达慕的发展 [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 (11): 36-37.
[6] 那·恩和, 确吉. 蒙古族那达慕 [M]. 呼伦贝尔市: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7.
[7] 夏宁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探究 [D]. 云南艺术学院, 2011.
[8] 李凤新. 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 [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3(1): 12-17.
[9] 刘滨鸿. 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D]. 中央财经大学, 2022. DOI: 10.27665/d.cnki.gzcju.2022.000608.
[10] 丁霞. 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策略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S1): 73-75.